

=====

文革博物馆通讯（九七八）·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四六期（zk1810b）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二〇一八年十月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亡灵祭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文化革命中非正常死亡事件调查	周 平
【劫后反思】	我的忏悔——从人到“驴”的自白	卢晓蓉
【史海钩沉】	火烧英国代办处，改变历史走向	李 辉
【出版动态】	《北大文革武斗纪实》序和跋	奚学瑶·张 从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亡灵祭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文化革命中非正常死亡事件调查
（1966·6—1970·12）

中国科大文革非正常死亡事件调查小组·执笔：周 平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人命关天，自古以来，非正常死亡的案件都是天大的事件，无论哪朝哪代，谁都不敢敷衍草率。可是，文革以后直到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科大在文革中到底有多少非正常死亡案例？又是何时何地何因如何发生？至今仍是一笔糊涂帐。

一群经历过科大文革的老人，在垂暮之年为了记录历史的真相，也为了告慰逝者的在天之灵，对这些事件进行了探查和追踪，初步核实的名单（不完全统计，尚有少许遗漏无法补齐）共19名，包括8名在校学生和11名教工。

下面是我们的初步调查结果，我们并希望经历过这段历史的知情人提供更翔实的信息，使这份报告更真实全面：

1，645学生糜星星，于1966文革开始后不久，其父亲（时任外国专家局局长）被批斗，他班上的同学也对他进行了批斗，使他受到极大压力，在班上批斗会以后第二天早上，在北京家中上吊自尽身亡。

2，6366学生计明华，毛著学习积极分子，是中共党员，1966年8月以后，因不同意对刘少奇的批判，与人辩论刘少奇问题，几天几夜不睡觉，竟至引发神经疾病而送回上海家中。1967年三月接到学校的学生返校通知后，有同学相约某日一起去火车站买票，但该同学去他家时得知，计明华已于3月12日在上海家中自缢身亡。

3，物理系固体电子教研室教员张敏修（女）在北大上学期间有右派言论被写进档案，家庭出身又不好，文革时被人把档案资料泄露给学生，1968年十月清理阶级队伍开始

后，一天上午，学生们开始对她进行“询问”，她感受到极大压力，当别人去吃中午饭时，她在北京玉泉路校园11栋（女生宿舍楼）楼顶喝敌敌畏自杀身亡。

4，物理系物理教研室教员季为之，业务很好，但出身不好，曾去过波兰参加学术会议。文革中被怀疑为敌特分子被逼交代非法活动，受到极大压力。大约在1967年，他在玉泉路校园物理楼和教学楼结合部的一个房间把电线绑在身上，接上动力电，触电身亡。

5，工教研室教员邓启金在1967年因出身地主被全家遣送回广东老家，在家乡跳河自尽。

6，数学教研室教师周进聪是归国华侨，身体强健还会武功。1968年，北京高校武斗开始，科大两派为了准备武斗，周作为延安公社骨干，每天教一些人练武功，被对立派东方红公社的学生以特嫌为名绑架，于1968年8月4日在玉泉路科大教学大楼被殴打致死。

7，校医院医生杨占圭，在周进聪被打死后被叫去看“病”。他发现周已经死亡后，被威胁要“保密”。回到家中，恰好当晚北京市统一查户口，他听到有人敲门，在恐慌中企图逃跑，用绳子从窗口爬出，绳子断裂后坠楼死亡。

8，6222学生张俊仙因为其父亲有历史问题，被班上同学抄家，又被隔离并强迫劳动。1968年5月30日在中关村（科大分部）学生宿舍内自杀死亡。（也有同学称张俊仙被看管他的同学殴打致死。）

9，有机化学教研室教员蔡家模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在玉泉路校园物理大楼跳楼自杀身亡。

10，6367班学生武俊章在1968年8月9日到8月20日工宣队进校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在宿舍里议论工宣队，被人揭发报告给工宣队，一天班上同学被叫到教学楼6层中间的教室开批判会，会后他从玉泉路校园教学楼顶楼跳楼自杀身亡。

11，地球化学教研室教员朴宏道（朝鲜族）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因涉及叛国投修（指朝鲜）案被关押审查，受到极大压力，1968年11月6日下午6时左右在玉泉路校园物理楼从厕所窗口跳楼自杀身亡。

12，6422学生阎宝根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在安徽工宣队长李东林的威胁压力下在合肥科大校园跳楼自杀，当场并没有死亡，李东林拒绝抢救使他最终死亡。

13，6422学生郭宝林被人揭发用毛主席语录牌做收音机盒子，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因工宣队的压力使其精神失常，1970年8月2日在班上其他同学分配离校的当天，他被宣布为推迟分配，在其他同学聚餐时他逃离对他的监控，在淮南煤矿卧轨自杀。

14，6435学生韩光增（女）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因三系工宣队长张广泉的压力，在马鞍山钢铁公司炼焦厂跳楼自杀，当场死亡。死亡当天张广泉召开全系大会，对韩继续进行批判，说想要用死来对抗运动办不到，要继续批倒批臭，要把一打三反运动进行到底。

15, 6566 学生贾树国, 1969 年工宣队派他参加“教工学习班”整那些出身不好的老师时, 因为自身隐瞒家庭成分(富农家庭虚报为中农), 被学习班的场面惊吓, 在北京出逃, 虽然后来找了回来, 却留下了“案底”。1970 年到淮南后,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因留下的“案底”而被隔离审查, 并以上厕所为名再次出逃, 于 1970 年 4 月 24 日晚卧轨自杀。

16, 人武部干部李恒昌是一位转业军人, 曾当过林彪的警卫员。被人揭露有不敬重林彪的言论(尚未到反对林彪的程度), 1970 年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在合肥科大校园悬梁自尽。

17, 四系干事张乃安于 1970 年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在合肥科大校园服毒自杀。

18, 5804 毕业生、留校教员王世伟于 1970 年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在合肥科大校园从教学大楼跳楼自杀身亡。

19, 房产科干部孙立本, 因历史上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 被认为是参加过反动组织受到批判, 1967 年(或 1968, 确切时间已不可考)在玉泉路教一楼楼下暖水管道自缢。

科大建于 1958 年, 文革开始时建校才 8 年, 是一所相对年轻的规模比较小的大学, 教职员队伍比较年轻, 没有太多的历史恩怨, 而且文革中也没有大规模武斗。根据 1968 年的数据, 在校教职工 1752 人, 在校学生 3056 人, 总计为 4808 人, 如果把这个数字当作文革期间在校的总人数, 按照现在已经确认的人数 19 人, 非正常死亡比例已达到千分之四, 特别是教工达到了千分之六点三, 可谓触目惊心! 这 19 人中, 除了周进聪和那位校医, 是因两派斗争分别被打死和吓死以外, 其余 17 人均系自杀(自缢 4 人、跳楼 6 人、跳河 1 人, 卧轨 2 人、服毒 2 人、触电 1 人, 自杀 1 人), 看看他(她)们的自杀方式, 想想这些人都不过是些手无寸铁的书生和平民, 就可感受到文革运动的酷烈。实际上, 科大的两位主要领导——党委书记刘达和校长郭沫若, 就各自有一两个儿子在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 1967 年初, 刘达的儿子刘晋, 虽然没有参加任何一派群众组织, 却被造反派乱枪打死; 不久后, 1967 年 4 月, 郭沫若的儿子郭民英在部队自杀, 一年后的 1968 年 4 月, 郭沫若的另一个儿子郭世英在北京农业大学受到关押“审查”, 从三楼的关押处跳窗自杀。提及他们两人的三个子女情况, 似乎超出了题目范围, 但无论作为时代背景还是作为科大人的记忆, 写在这里都是必要的。

自杀的原因当然都是出于对自身前途的绝望。至于为什么要自杀, 归纳起来, 17 个人中, 两人是因为文革中父母受到冲击而在家中自杀, 5 人是因为个人历史或其它问题受到周边压力而想不开, 10 人因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被工(军)宣队整得无法承受而走上绝路。总之, 其中三分之一的人, 主要是因为文革大环境和家庭受冲击。而跟北京其它高校不一样的地方, 是没有一个人真正因武斗而死, 却有百分之六十以上, 在 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和 1970 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工宣队整死。

在本文结束以前, 还有一位非正常死亡的科大老前辈需要特别提及。他就是因飞机失事而牺牲的科大建校时的创始人之一、原中科院力学所副所长、科大首任化学物理系主任、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23 位元勋中唯一的烈士、也是唯一一位为中国核弹, 氢弹和卫星实验工作均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巨匠郭永怀先生。郭先生的夫人李佩为科大外语教研室教师, 他的遇难同李佩在科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受到隔离审查有关, 详见本

文集华新民：“李佩在郭永怀遇难前后的遭遇”一文（见本刊 z k 1 7 0 2 d），郭永怀先生的牺牲，是科大永远之痛，也是共和国永远之痛。

□ 来源：《我们心中的科大》文集，2018年

~~~~~  
【劫后反思】

我的忏悔——从人到“驴”的自白

• 卢晓蓉 •

《现代汉语词典》对“忏悔”一词有两种解释，一是“认识了过去的错误或罪过而感到痛心”；二是“向神佛表示悔过，请求宽恕”。这两种说法在形式上都是当事人对自己行为的内省。至于是否向受害人赔礼道歉，或主动承担自己应负的那部分道义上的责任，也就是公开的忏悔，词典上没说，这符合中国国情。当我们强烈要求日本政府为侵华战争中死难的千万生灵向中国人民赔礼道歉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也应该为在内战、在“饥荒年代”、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屈死的数千万同胞和侥幸没死却生不如死的数亿万生民忏悔？我们历史上有几位皇帝曾下过“罪己诏”，但我们现在没有勃兰特。

因此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认为自己与忏悔无缘。因为我自幼被打入“出身不好”的另册，备受歧视和屈辱；我高中毕业被拒之于大学校门外，在农村度过了“文革”，既没参与对老师的批斗，也没欺侮过农民，更未动手打过任何人；我在爱国知识分子父亲和信仰基督教的母亲言传身教影响下，始终恪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条，对施害者也多所原谅。我下海之前在体制内领到的工资、奖金、福利总和不足六千元人民币，下海之后参与或主持引进的外资却超过千万元美金；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贪赃枉法……我都没有沾边，故我有一千条理由不忏悔。

但是，当我读到镌刻在美国波士顿“二战”犹太人蒙难纪念碑上的德国马丁神父的名言“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是新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时，受到深深的震撼。从此，一些曾被遗忘在记忆角落里的镜头便常常浮现出来啃噬我的良心：

反右运动时，我和小伙伴们曾追着“右派”邻居高唱当时流行的童谣：“右派，右派，全身都坏，脚上长疮，头上长癞。右派想飞，喷气式追，右派钻地，挖土机去……”。见邻居低着头，沉默无语，一脸的痛苦和无奈，我们还得意洋洋地接着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夹着尾巴逃跑了！”

“文革”中，我参加了区上召开的一次公审“现行反革命分子”大会。一个衣衫褴褛的人被五花大绑推到台上。他的罪名就是把那块关乎千万知青命运的语录牌摘了下来，并在上面放了一封写给我们农场知青的信，信中婉言劝说我们回到父母身边去，不要留在农村给农民增加负担。一个义愤填膺的青年农民跳上台去，当胸一拳把他打得口鼻流血，台下“×××，罪该万死，死了喂狗，狗都不吃”的批判声浪中也有我的吼叫声。

在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栏目到重庆举办时，主持人吴小莉问在场的嘉宾，重庆历史上有哪些不能忘记的人，应答者众。吴小莉却说：“有一个重庆人，可能很多中国人都不知

道，很陌生了。但毛泽东说过，他是不能忘记的人，蒋介石对他也有过高度的评价，称他是民族英雄。这个人是谁呢？一个不能被忘记的重庆人，他就是卢作孚。”看到这里，我热泪盈眶，无地自容。因为卢作孚是我的祖父，在盲从和迷信篡改了民族正史的年代，我也将祖父淡忘于彼岸世界历三十年之久。

如果人皆如我，同样的灾难必定再度加害于我的子孙后代。我再也不能毫无愧色地面对祖父在天的英灵和马丁神父高尚的品格。因此，我没有理由不忏悔！

#### ◇ 蒙昧的起点

马丁神父所言“我不说话”至少有两个前提，一个是因精神养分短缺带来的无知愚昧盲从迷信，当事人真诚地以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是唯一正确的真理；另一个是由接连不断的人为惨剧所引致的常态化的恐惧氛围，即如杨继绳所言，“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从“我不说话”到说假话、套话、做伪证、栽赃陷害其实只有一步之遥，正如一头驴，可以拉磨碾米，也可以拉炮打仗。思想层面的盲从迷信和心理层面的恐惧害怕相辅相成，汇成一个巨大的冲击波，裹挟着亿万民众，也包括几乎所有的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共同完成了空前但愿也是绝后的造神运动，打开了“潘多拉瓶子”，放出了大大小小的“魔鬼”，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也使自己深受其害。始作俑者毫无疑问是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应该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但每一个盲从迷信参与者都难逃其咎。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的无知愚昧盲从迷信是从六岁开始滋长蔓延的。1952年3月中旬，父母亲带着六岁的我和幼小的弟弟从香港回到了家乡重庆。在此之前一个多月，我的祖父走完了不到五十九岁却功业卓著、自身修养近乎圣贤的人生之路。为了实现“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宏伟理想，他一生曾作过无数次选择，却从未偏离初衷。结束生命、魂归信仰是他最后的选择。我的父亲在遭遇这一灭顶之灾时，没有忘记祖父生前要他“早点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的叮嘱，作为长子他还要承担为中年丧夫的母亲尽孝道的责任。父亲回来后放弃了去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研究院或机关单位工作的机会，毅然落户于重庆郊区的民生机器厂。这间工厂是我祖父继1925年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后于1928年底兴办的。工厂的主要任务是为民生公司的船队修船和造船。祖父的挚友、著名作家李劫人曾任过该厂厂长。

我在香港五岁就上了九龙塘学校，那是一所名校。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是高我几个年级的校友。我刚读了一个学期，已能认字、写字，可以把“蝴蝶”等多笔画字写进作业本的小方格里去；还学了算数、自然，比如摩擦生电等等知识。回到重庆以后，我被告知要听党的话，七岁才能上小学。这么一来，我不得不放弃了九龙塘学校的半年学业，还留了一级。记忆中，这是“听党的话”给我最初的印象，我的个性朝着党性的归顺便由此开始。与此同时，我的命运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当时如果继续读下去，应该在1963年高中毕业，那一年正是“三面红旗”和“三年灾害”折腾结束后百废待兴的大好时机，大学招生基本上做到了“有教无类”，只看成绩不看出身，我考上大学是没有问题的。而一休一留之后，我便推迟到1965年高中毕业，刚好撞上教育战线大刮“贯彻阶级路线”风，不仅让我提前进入了“文革”的预演，还要“让地主资产阶级在文化上断子绝孙”。我成绩再好，认识再跟上形势，也属于大学“不宜录取”之列。

我在重庆上的小学是民生厂子弟校。老师们对我的祖父和民生厂知根知底，且大多有很好的学养，使我得到了比较完善的发蒙教育。怀抱“人人皆为园艺家，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理想的祖父，把民生厂所在地青草坝也建成了一个花园。我在这个一年四季都绿茵葱茏、鲜花盛开的大花园里，度过了快乐纯真的童年和部分少年时代。但“树欲静而风不

止”，我们被告知红领巾是党旗的一角，“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号召“向科学进军”，我们就推行“小五年计划”，比如把梧桐果炒熟以后在锅里熬成汤再加点盐作成酱油，自己都不敢喝，却被选送去市里参加成果展；党宣布“总路线”，我们虽不能领会，却载歌载舞到城里街头作宣传；党发动“大跃进”，我们就睡在教室的课桌上，半夜起来背石头砌土高炉；党下令“除四害”，我们就停下功课到郊外轰打麻雀……作为少先队和班级的主要干部，我是这些活动积极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只要是党的需要，无论有多大困难我都率众趋之若鹜。五年级时学校带领我们下乡劳动十天，我一边想家想到抹眼泪，一边却给学校出的《简报》写了一首小诗《青松赞》，表示“要像青松一样，不怕风吹雨打，傲然挺立在山崖上”。

我初试阶级斗争的“风吹雨打”是小学三年级，即反右运动的前一年。厂里请了几位苏联专家来参观，要我们学校派几个少先队员去献花，我也被选上了。哪知就在献花前一天进行彩排时，我被莫名其妙地取消了献花的资格。在同学们一片质疑的眼光中，我走出教室的腿重如千斤。虽然这个打击比起我后来的诸多遭遇算不了什么，但毕竟是我第一次受挫折，所以很难受。母亲很镇静地安慰我要经得起考验，学会忍让，还叫我把她专门进城为我买来献花穿的一件新毛衣，借给没有新衣服的同学穿着去献花。就在那些时候，我们家中与祖父有关的物品，比如他的照片，他的重要文章印制的单行本等等，都悉数不见了踪影。父母在我们面前从此再也不提祖父的事，大概是怕我们年幼无知，祸从口出。

很快，反右运动开始了。就在我们不知天高地厚地唱骂“右派”分子之后不久，我又遇到了一件事。有次全校做早操时，和我同班的厂党委书记的女儿，气势汹汹地领着两个女同学走到我跟前，当众说我偷了她的钱。我受家庭熏陶很看重人品，听了此话不由怔住，脸唰一下子就红了。她见状越发得意，并借题发挥在班上孤立我。她诬我偷钱的理由是，前一天我看到她口袋里掉了两毛钱在地上便告诉了她，所以我知道她身上有钱可偷。这件事让我难过了好几天。校长知道后，很快就在全校大会上批评了她，还说了句我一生一世都不曾忘怀的话：“像卢晓蓉这样的家庭教育，别说是两毛钱，就是二十块她也不会偷！”校长是女的，叫周淑芬，人和名字一样文静。我真不知道斯文瘦弱的她，哪来这么大的勇气敢于公开批评党委书记也就是她的顶头上司的千金！就在“偷钱”事件之前不久，这个党委书记曾亲自到我家里，动员我父亲给党提意见。父亲很真诚地回答，“我有意见平时都提了，现在没意见了”，让唯一一次“作客”我家的书记白跑一趟。后来父亲为自己那次没有中“阳谋”当成“右派”感到庆幸，但他终究没有逃过“文革”的炼狱。

我从母亲的宽容博爱学到了善良，从父亲的慎言笃行学到了忠厚，从小学校长的仗义执言学到了正直。然而，时隐时现的政治斗争、血统歧视和人格侮辱所引致的恐惧感和疏离感，却像黄曲霉菌一样在我的血液中发酵生长，并从此在潜意识中左右着我的选择。为了取得“组织”的信任，我唯有不断努力紧跟主流意识，却无形中掐断了智慧树上独立思考的嫩芽，隔绝了通往祖父那个世界的道路。我曾隐约感到“取消献花资格”、“偷钱”事件和其他一些突如其来的波折与祖父的“消失”有关，但很快就忘到了脑后，因为我相信祖父是个好人，这是在青草坝这块土地上时时可以感受到的，我以为这就够了。大炼钢铁时，我曾和小伙伴到民生厂的防空洞里去掏拣废铜烂铁，拿去喂“鸡窝炉”挣表扬，却不知道这个防空洞是抗战时厂里的干部工人们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开凿的；也不知道在这个绵延1英里的地下工厂里，每天都有上千的工人和技术员昼夜不停地生产零部件，以满足战时修造船舶的需要，从而保障了唯一连通前线和后方的水上运输大动脉的畅通。我在那块埋藏着无数历史遗迹，闪耀着人性与智慧光辉的土地上足足生活往返了28年，却从未想到去探寻这方面的事迹，开发这座“金矿”。我与盲从迷信越走越近，与祖父和他的精神事业渐行渐远。数十年后，当我有了寻找真相的冲动时，民生厂已变成一堆废墟，青草坝也成了一座荒山。

## ◇ 历史的盲区

1959年秋天，我考上了巴蜀中学。这所中学与同名小学及幼儿园统称巴蜀学校，创建于1933年，从彼时到如今都是重庆的名校。我的父辈中有不少人在那里读过，当时是只看成绩不看出身的。到我进入这所学校时，它被坊间称为“两头尖”，即干部子弟和民主人士子弟都比较多。这一点我父亲是不大清楚的，他对自己的判断和我的学习成绩很有信心，所以要我务必把巴蜀中学作为唯一志愿。结果我一举中榜，父亲如愿以偿。但他后来很可能为这个选择后悔终生。为了宽解他的自责，我从未和他提起这个话题，直到他离开人世。

我中学班上的同学主要来自重庆市的三所重点小学，即也是“两头尖”的巴蜀小学、以干部子弟为主的人民小学和以军干子弟为主的八一小学。我们这些来自其他非名牌学校的学生，不足全班四分之一。同班同学中有江姐的儿子彭云，有双枪老太婆的外孙，还有不少同学的父母都是地下党或南下干部，并且正担任着该市党政军要职。在这个红得发紫的新集体里，我感到非常陌生和孤独。刚进中学时，我也曾有过一次反叛。我们班是住读班，一周只能回家一次。再说我的家离开学校很远，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也不可能天天回家，因此我很想家，很怀念小学同学。第一个周末回家，我缠住母亲哭闹着要求转学到我家附近的中学走读，最后当然以我的失败告终。

如果在巴蜀的路让我自己走，我只需管好我自己，有时间读一些课外书，也许会养成多向思维的习惯，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然而，开学不久，班主任就把少先队中队长的职务交给了我。因为初中同学大多还是少先队员，所以中队长不是一个闲职。我要么坚持不就，要么不负责任放任自流，要么挑起重担让这个原本就非同寻常的集体名副其实。我的天性和潜意识决定了我只能选择后者。我内向而不善言，和一个个背景、资历、见识、能力都远在我之上的同学相比，我就像一头“大驴子”（我在中学的外号叫“大卢子”，四川话中两者发音相同），只能靠“勤能补拙”为全班同学服务，为班级争名誉，不惜把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在了社会工作上。上高中后，我的职务改成了班长和年级主席，社会工作更多了。据说有一次团市委来学校检查学生干部的课外负担，把“卢晓蓉一周开了23个会”作为典型上报。这个调查结果未免太夸张。真实的情况是，我以“服从党的需要”为宗旨，放弃了自身的知识积累和人格修养，退化为没有灵魂的“砖头”和“螺丝钉”。

上初中不久，全国性的饥荒就开始了，由于四川省的极“左”思潮和浮夸风领先于全国，所以饥饿的时间、强度和饿死人数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我们这个重点中学也不例外。也正是那时候，小说《红岩》出版，很快就风靡全国乃至海外。《红岩》代表人物江姐的儿子就在我们班，我们不带头谁带头？我们把江姐在狱中给亲戚写的信，“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作为战胜饥饿、刻苦学习的座右铭。我们主动申请“为党分忧”，将原本就吃不饱肚子的每月定量男28斤、女25斤降到男女平等的21斤。经过中间层层克扣盘剥，到口的粮食就更少了，饿得我们常常以盐巴、酱油汤充饥。其实我当时就知道，许多干部家庭是没有定量限制的，米饭馒头鸡鸭鱼肉随便吃，我以为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他们不享受谁享受。而我班非干部家庭的同学却跟着饥民一起挨饿，特别是一些活动量大的男同学，不知道那些日子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几年之后，我和一批因“出身不好”没考上大学的同学去了农村。初始办农场时，又一次经历了饥饿的煎熬。由于定量低、缺油少菜见不到肉，还要参加重体力劳动，我们常常饿得前胸贴后背。有的同学就用家里带来的零用钱到集市上加餐。上面知道后，要农场党支部书记传达指示，进餐馆说明我们还有资产阶级思想，改造不彻底。我当时担任农场团支部书记，当即从命把一个到场里来卖包子的小贩阻挡回去。这虽

是后话，但两件事说明同一个问题，个性的泯灭将会带来人性的麻木。我一心一意听党的话，却闭目不见身边的同窗和战友。无论他们是否责怪我，我都要向他们赔礼道歉。

1963年我们上高二的时候，红岩精神还炙手可热，“为人民服务”的御笔题词又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江姐等英雄人物虽令我们崇敬，但他们要推翻旧政权的革命行动，我们无法仿效。而雷锋则是新时代的代表，很容易学以致用。我就曾经帮人家推平板车上坡；我和弟弟还把迷路的小女孩送回家，并相约做了好事不留名。那一年全国上下以军队为榜样，兴起过一阵“评功摆好”的活动。自我记事以来，就那次群众运动不是批判人而是表扬人的。可惜好景不长，雷锋刚学了一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四清运动”就开始了。市委派出的工作组进驻了我们学校我们班，成立了工农革干子弟小组，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蓝本，按照家庭出身把全班同学分为“依靠对象”、“团结对象”、“孤立对象”和“斗争对象”，我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一夜之间沦为“斗争对象”。一位初中和我同班的干部子弟多年后对我说：“你真糊涂，我早就看出他们对你有阶级歧视，心中很为你抱屈，你怎么就没感觉到？！”我很敬重的一位老师形容我当年就像一头“被蒙上眼整天围绕磨盘转的驯良动物”。我纯属自作自受，咎由自取。

这时曾动员我担任年级主席的政治老师找我谈话，要我批判我祖父，说他当过国民党政府的高官，与人民公敌蒋介石有过往来等等。接着班上的工农革干子弟小组也要我揭发批判祖父的“罪行”和交代自己与家庭划不清界限的问题。所举例子有，我说过祖父是靠勤俭起家的，不是靠剥削起家的；说过自己是家里的孝子贤孙；有同学揭发我们家平时吃得比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同学家里过年还好等等。其实有些话我没说，有些话是顺口说的，至于“平时吃得好”，则出自母亲有一次为了招待跋山涉水来我家玩的两位同学，特地去餐馆炒了几个菜。再说我父母都是工薪阶层，靠自己的劳动吃饭何过之有？但是早已习惯单向思维的我，还是选择了接受批判。由于对祖父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对父母的言行挑不出什么毛病，我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深挖”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比如恋家呀，注重学习成绩呀，工作作风主观呀，缺乏斗争精神呀等等，实在找不出什么了，就怀疑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是不是已严重到不知道有资产阶级思想了。在麻木与困顿中度过一年之后，我负责帮助的两位成绩差的干部子弟同学考上了大学，我落榜了。

巴蜀中学在庆祝七十周年校庆时出了一本《校史》，里面有这样一段话：“1932年夏，王瓚绪通过著名实业家卢作孚（时任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和著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推荐，聘请江苏教育界知名人士，时任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学校兼附小主任的周勳成入川办学。”又说：卢作孚“与王瓚绪等一起创办巴蜀学校，任首届校董。其后多次出资支持学校建设发展，成为巴蜀学校的主要管理者之一。”我这才知道，父亲当年为何非要我考巴蜀不可。其实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祖父就发表一系列文章呼吁：“国中万事，希望若绝，寻求希望，必于教育事业”，并强调“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祖父一生坚定信仰，咬准目标，竭尽全力去实现他青少年时期就树立的理想，虽只读了四年正规小学，却成为“一个不能忘记的人”，身后留下的“民生公司、北碚实验区、《卢作孚文集》”，其中任一项都足以改变历史”。而他疼爱的长孙女我，却在正规中小学的校园里蒙着眼睛转了十二年半的圈圈后，带着对知识和教育的漠视，上山下乡以求脱胎换骨。

#### ◇ 脱胎换骨的代价

还在上高三的时候，我就预料自己十有八九考不上大学，因为比我高一年级的几位优秀学生皆因“出身不好”没考上大学，去了农村。我丝毫没想过这是为什么，只在心里盘算与其落个考不上大学的名声，还不如不参加高考直接去农村。再说，既然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已经严重到浑然不觉的程度，更应该去农村彻底改造思想。为此，我一连给学校写了六份书



面申请。哪知学校不但没有批准，还两次叫我改填大学报名表，把我原先填的第一志愿“北农大”先后改为“北大化学系”和“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事隔七年后我偶尔看到了这张报名表，上面赫然写着“此生不宜录取”并盖上了学校的大红印章。我才恍然大悟，学校当初这样做，是为了制造我志愿填高了考不上大学的假象。不久前，我当年的一位校友得知这个真相后，曾问我，你们为什么不像犹太人不屈不挠追踪纳粹逃犯那样，追查清楚究竟是谁有这个权利判决你们“不宜录取”？可惜我们当时所受的教育，尤其是文史教育，多是被阉割和伪造的，有如精神的“三鹿奶粉”，不仅造成我们精神营养的短缺，还患上了不会“排毒”的后遗症。人性的软弱，人格的扭曲，使我们丧失了捍卫自身权利的觉悟和能力，更不用说为社会承担道义的责任了。

没考上大学，我为了兑现“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承诺，便和本校三十多位同命相连的高初中毕业生一道，去了四川最艰苦的地区之一、当年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大巴山区万源县，在那里生活了十三年。与大巴山一脉相连的嘉陵江三峡地区，曾是四县交界、土匪出没、民不聊生之地，我祖父在1927年受命出任该地区峡防团务局长剿匪和维持治安。但祖父的志向却远不止于此，他“不仅要消灭土匪，而且要消灭产生土匪的土壤”，要把以北碚为中心的这个区域“经营成一个灿烂美妙的乐土，影响到四周的地方，逐渐都经营起来，都成为灿烂美妙的乐土”，作为“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祖父在开展经济建设的同时，更重视文化建设，在那个地区陆续创办了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馆、图书馆和中小学等。“把地方所有文化、教育、经济、卫生各项事业，不上几年，建设得应有尽有。”（黄炎培《北碚之游》）1948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北碚定为“基本教育实验区”，以表彰它对文教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抗战期间，北碚还先后安置了众多政府机构、大专院校、科研机关，接纳了数以千计的著名学者和文化人，被誉为“陪都的陪都”、“东方的诺亚方舟”。

时隔四十年后我去大巴山时，对祖父这些业绩全然不知。我既无高远志向，也无明确目标，只凭几句口号和发热的头脑就去了穷乡僻壤，非但没有把新知识、新技术、新生活方式带给当地农民，反而努力向他们看齐，与他们同化，还阿Q似地自慰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办了两年农场后，接到省委“拆场插队”的指示，又分散到生产队落户，原因在于“知青集中在一起，不利于思想改造”。当地纯朴的农民其实很看重我们，认为我们有文化，心眼好，信得过，凡是称斤记帐之类的事都交给我们干，也爱给我们讲真话，譬如讲大跃进时，上级为了争高产、放卫星，搞什么土豆播种“楼上楼”，小麦播种“撒满地”，结果不仅颗粒无收，连种子也赔了进去；讲大炼钢铁前，村子里的小道旁都长满了参天大树，白天走路都“阴森恐怖”，大炼钢铁时都砍了去炼钢，现在已经光秃秃的；讲吃大锅饭时，村里的家庭都分居，女人孩子住屋里，男人住猪牛圈，家里的锅灶都打得稀巴烂；讲三年饥荒时，村子里原有一百六十多户，死得还剩一百二十多户；讲张国焘在的时候，杀了很多，还指给我们看，那那就是埋死人的“万人坑”。可是我却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从来没有想到要去寻根究底。

我在乡下生活了十三年，亲眼见到“解放”了二十来年的农民还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最让我触目惊心的是，村里的农民因为穷，买不起衣服，买不起线，只能买一毛多钱一尺的白布，一毛钱一包的染料，染成黑布或蓝布，再用自己搓的麻绳缝衣服，还都是补丁重补丁；妇女来月经，连最次的草纸也买不起，就用破布代替，照样下田下地干活；生了病没钱看医生，死了就说是“天收了”；吃的都是半年红薯半年土豆，很少见到大米小麦之类的细粮，到了青黄不接时，家里还常常断炊，可是却要挑选上好的粮食交公粮……对这些每天都在眼前发生的苦难与不公，我居然也是熟视无睹。我原本有的是机会，为农民做点实事，最起码可以做些社会调查，收集第一手资料，为历史留下真实的证词。可是我光顾了效忠于“神”，却把这些用自己孱弱的身躯支撑着泱泱华夏终不致坍塌的父老乡亲抛在了脑后。人

情和人性冷漠到如此程度，令我自己都难以置信。现在每逢看到农村素材的电视片，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掉眼泪，这是感触的泪，更是悔恨的泪。我应该对那些家贫如洗，却毫无保留地收容了我们的大巴山农民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最深刻的忏悔！

“文革”开始时，我们身在农村，也敏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主动投入了对《海瑞罢官》、《三家村》的批判。可是区委书记却在全区“三秋”生产动员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我们“关心政治，不关心生产”，我们就写了他的大字报。那是我平生唯一的一张大字报。不久以后，我受知青们的委托到北京上访，沿途所见的一切，比如火车上首都红卫兵侮辱隐瞒出身的“地主婆”；北京批斗毒打“走资派”；餐馆里“出身好的坐着吃，出身坏的站着吃”，“出身好的吃馒头，出身坏的吃窝头”的血统歧视以及铺天盖地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等，使我失望而归，可惜却没有因此而醒悟。后来我参加了当地的农民组织，参与了对“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的批斗。虽然恪守不动手打人的原则，但我不能因此而开脱自己的罪责，因为在这场打着“革命”的旗号，行反人性、反人道、反人类之实的“大革文化命”运动中，我没有说“不！”每当我想到那位勇敢地站出来，劝我们知青回到父母身边去的农民当胸所挨的那一拳；想到因为参加了抗日远征军，而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和“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父亲在“文革”中所遭受的精神和肉体的凌辱，我就不能原谅自己的愚昧与盲从。

我父母亲保存了几封我在农村写给他们的信，其中一封是1971年得知在长春的二姑一家连同我七十岁的祖母下放农村时写的，信中说：“知道保保（即我二姑）一家要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消息，我非常高兴和放心。高兴的是，保保和程叔叔（即二姑夫）响应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也毅然踏上了这光荣的革命征途，事实进一步证明了四年前，我走的这一条路走对了，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光明。放心的是，他们到了农村，到了贫下中农中间，思想就会炼红，身体就会长好，打起仗来，就会绝对的安全了。婆婆年纪虽然老了，但到农村去，对她的身体还适合些。以后，（等）他们的地点落实后再给他们写信。应该认识到，这还是一项伟大的战略措施，可以为将来的共产主义建设储备一批技术力量！”信中除了“打起仗来，就会绝对的安全了”和“可以……储备一批技术力量”这两句还算人话外，其余那些八股文，等同于驴叫。我祖母那时已年逾七十，在乡下负责为全家做饭烧炕，晚上三代人同床共眠。而她在我写这封信的年龄时，她的丈夫即我的祖父已经在教育、实业和乡村建设三大领域的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并明确提出了以“现代化”为“公共信仰”，以“新的集团生活”取代旧的家族制度，以动员全国人民投身“产业运动、交通运动、文化运动、国防运动”的方式，“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一整套主张。祖父绝对想不到，事隔三十多年后，我除了“早请示”、“晚汇报”，唱“忠字歌”、跳“忠字舞”，举着蜡做的芒果游行喊口号，对远在十万八千里外的“红太阳”顶礼膜拜之外，脑子里几乎一片空白。

林彪事件发生后，我先听到小道消息。过去无论国家的形势有多么糟糕，我对最高领袖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始终坚信不移，总以为是下面的人不听话，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现在毛主席最可靠的接班人竟然叛逃、摔死在温都尔汗，我开始担忧起来。哪知此事件解密后，县里要我参加批判林彪“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得到如此信任，我很快打消疑虑，重拾信心，并庆幸可以借此机会摆脱几天繁重的农活。不过我很快就体会到，批判“纪要”并不比体力劳动轻松。比如“纪要”说，“农民生活缺吃少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被利用变成了替罪羔羊”、“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等，明明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却要在宣讲中说这都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诬蔑，要把它们批倒批臭。我去宣讲的地区有座设施非常简陋的煤矿，工人进矿采煤都是爬进爬出。那天刚下班就赶来听讲的矿工，除了眼白是白的，全身都是黑的。我看不清他们的面孔，他们也听不懂我的口诛。这些年每逢煤矿出事，我眼前就浮现出这一幕。无论历史对林彪事件如何评价，我对自己在那次行动中口是心非、颠倒黑白的言行深感羞愧。

1972年我因为给大队党支部写了一篇《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整党建党》的总结材料，得到县革委和地区革委会的重视，被上调进县革委文教局。命运有了如此大的转变，我就更加努力，更加勤奋，因而成为“县革委大院里最忙的人”。但好景不长，半年后接军宣队通知，像我这种出身的人，怎能在县革委工作，于是便被扫地出门，调去一间边远农村小学。后来虽换了几个单位，在我填写的任何一张登记表“家庭出身”栏里，我自己写的“职员”都会被别人改写成歪歪斜斜的“资本家”。1978年我在县电影公司做办公室工作。公司下辖一个城区电影院和四十多个公社放映队，办公室就我一人，事无巨细，包括党员档案管理均由我这个非党员承揽。有次地区来县里检查档案管理工作，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要去地区开会。单位领导却对我说，按上级规定，管理档案的人必须是党员，你连党员都不是，没有资格参加代表会。此话无异于向我宣告，上山下乡十三年脱胎换骨终成泡影。我从小就“听党的话”“跟党走”，历经二十五年余的刻苦修炼，到头来不过还是一头蒙着眼睛转圈圈的驴！

我后来曾扪心自问，如果我有“红五类”的出身，并因此而成为“文革”前最后一届大学生，有资格参加城里的“红卫兵”，我能心明眼亮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吗？在面对专制强权的铁窗和极刑时，我能像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王申酉们那样挺直了腰杆为了捍卫真理而不惜忍受酷刑和精神折磨乃至献出生命吗？按照我当时的认知水平和心理准备，我不但做不到，而且很可能还会加入批斗他们的队伍之中。我和王申酉是校友，在华东师大政教系的阶梯教室里，党委书记施平为我们七七、七八两级学生做了一次极具启蒙意义的演讲。施平书记满怀深情介绍了王申酉的事迹，高度评价他被监禁时写的那封公开的“情书”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我当时深受震撼。退休之后，我写了《人格的魅力》和《“文革”疯狂中冷静的思想者王申酉》两篇文章，作为对这位英雄校友的深切怀念，其中不无洗刷自己愚蠢盲从的动机。

我原以为作完这番忏悔，就能让心情得到放松，灵魂得到解脱，殊不知我的忧虑更重了。在检讨“我不说话”带来的祸害时，我分明看到“我不说话”的巨大惯性还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盘桓。现实世界的假货泛滥、腐败成风、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贫富分化、人权遭到漠视等等，岂不都与“我不说话”有关？！等到警告变成了现实，新的灾难“奔我而来”，再说话就来不及了。事不同而理同，此灾难与彼灾难，起因和结果都一样。

祈望我在有生之年能从“驴”变回人，这样就有资格去天堂见我的祖父了。

〔卢晓蓉，女，1946年生。祖父卢作孚是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乡村建设先驱和社会改革家。曾在四川大巴山上山下乡十三年。华东师范大学七八级经济专业本科毕业。后下海经商，做过企业高层管理、副研究员。现为香港作家联会永久会员，曾出版散文集《水咬人》和《人生的万花筒》，三次获冰心文学奖。〕

#### ◇ 附：卢作孚简介

卢作孚是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乡村建设先驱和社会改革家。他创办的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民国时期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在抗战中做出了彪炳史册的重要贡献。他主持的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现代化乡村建设，是“中国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个，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最完整的历史记录”。他关于“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思想理论和成功实践，对当今现代化建设仍具参考价值。他毕生从事学校教育、职业教育、民众教育，其成果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充分肯定。他“大公无私，为而不有”，为中国企业家赢得了良好声誉。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本书序言中指出，卢作孚的创业精神

和卓有成效的企业管理与企业文化建设经验等，值得当今企业管理者学习、借鉴。在2003年重庆市评选的“十大文化名人”中，卢作孚名列第一，评语指出，他留下的“民生公司、北碚实验区、《卢作孚文集》，其中任一项都足以改变历史”。本书收录了卢作孚从1916—1951年间的著述124篇，涉及工商管理、企业文化、教育改革、乡村建设和国家现代化道路的论述等内容。

□ 来源：《汉尊2》微信号

~~~~~

【史海钩沉】

火烧英国代办处，改变历史走向

• 李 辉 •

◇ 从陈毅手中夺权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武汉发生的“百万雄师”绑架王力等人的突发事件，旋即成为一个新的热点。王力等人被解救回京时，机场出现了与姚登山印尼归来时同样隆重的欢迎场面，之后，天安门举行的盛大集会，更是将这位“中央文革”的重要笔杆子，推到了政治声望的巅峰。

王力到京时，姚登山已在外交部参与掌管全局。在此之前，王力一直负责“中央文革”的宣传工作，如今，天安门城楼上的风光无限，使他有了拓展新领域的可能。仅仅十天之后，王力、姚登山——一九六七年的两位风云人物，便有了一次极为重要的见面。八月七日晚上九点，王力召集姚登山和“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六名代表，到钓鱼台“中央文革”驻地谈话，从外交部部长陈毅手里夺权，正是此次谈话的中心话题。

外交部的夺权斗争，早在一九六七年年初已经开始，至七月中旬，达到高潮。罗英才在《陈毅的非常之路》一书中写道：

北京外语学院造反派组成“揪陈大军”，从7月15日起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架设高音喇叭，组织街头集会，拦截进出车辆，阻碍外事活动，扬言要揪出陈毅。周恩来闻讯后，及时紧急约见外交部系统造反派代表，向他们发出严厉警告：假如你们强行冲入外交部揪陈毅，那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走向自己的反面，我就要下命令让部队开去。今后谁也不许再去冲，不管哪一派，谁冲我就扣留谁。你们以为想打倒陈毅，陈毅就倒了？滑稽！（《陈毅的非常之路》，二五五页）

王力约见姚登山等人，起因是八月四日姚登山与“中央文革”关锋、戚本禹的谈话之后发生的事情。宋正民是“中央文革”当时派驻外交部的记者，他在《我在外交部亲历的几件事》一文中回忆说：

八月四日，在首都新闻界声讨港英当局迫害我新闻记者的会上，姚登山谈到外交部运动时，关锋和戚本禹都认为“造反派”到外交部揪陈毅大方向是正确的。戚本禹说：“陈毅，二月份是保了他的，但是他翻了案，我们的保也就收回来了。这是二月的事，现在已是三、四、五月过去了，为什么到现在几个月了，不让下去。”姚登山问：“是中央文革不同意？”戚本禹说：“哦，不，不，不，你怎么知道的？陈毅不下来，和中央文革没有关系，我们中央文革不管。”姚登山追问：“是不是总理一个人……”话没问完，戚本禹就岔到别

的问题上去了。姚登山把这次对话向外交部和部外的“揪陈大军”做了传达，一方面引起连续冲击外交部的事件，如北外“红旗造反团”冲进外交部三十号、四十号院和老部，强行架走乔冠华、姬鹏飞副部长进行审讯，令交代陈毅的罪行，还把两个副部长弄到王府井去卖打倒陈毅的小报……（《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见闻录》，二七〇页）

姚登山的做法，引发外交部另外一派“革命造反总部”的反对，遂致信中央，认为姚的传达与周恩来的指示相对抗，姚在外交部不提“打倒刘邓陶”而提出“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

走进钓鱼台的姚登山和另外六人，看到刚从武汉归来的王力正在养伤，小腿上仍打着石膏，他坐在躺椅上，与来人握手，发表一时颇为著名的“八七谈话”，姚登山听到了王力对自己的充分肯定与全力支持。《外交部文革纪实》一书叙述如下：

王力说：“我们可以明确表态，不赞成这个总部。他们的意见是不对的、错误的。姚登山在印尼造了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反，回国后也要造修正主义的反。修正主义就是走资派，你旗帜要鲜明，态度要明确，支持革命派，我们坚决支持你。”最后还说：“对外交部必须有鲜明的态度，这样阵线才能分明，坚决站在造反派一边。这样干部才敢出来亮相。”

……

关于“打倒刘邓陈”的口号，王力说：为什么不能喊？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评，做检查，就是可以揪。“六一六”对总理的态度是不对，要改。“红旗造反团”、“六一六”揪陈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大方向有什么错？！一点也不错。姚登山插话问：“不是总理不同意喊‘打倒陈毅’的口号吗？”王力说：“总理身份不同嘛。”（《外交部文革纪实》，一七〇——一七一页）

第二天，王力致信姚登山，针对外交部另外一派造反组织的来信，再谈揪斗陈毅事宜：

姚登山同志：

我们接到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八月五日的一封信，并附了你讲话的一个摘要。这封信和材料，关锋、戚本禹同志和我都看了。我们认为，革命造反总部这封信的精神是不好的，不对头。戚本禹同志讲的几句话，是正确的。你讲的话，也是对的。这些话引起群情激昂，高呼口号，是好事，是革命的景象。这些，为什么一定要加以反对呢？斗争的矛头究竟要指向谁呢？在要陈毅到群众中去检查的问题上，总理同文革小组的同志是一致的，企图从中寻找什么裂痕是徒劳的。现将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信和附件送去。

敬礼！

王力

1967年8月8日（载《东方红》，华东纺织工学院的东方红兵团，第七十九期，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 英雄姚登山，成为夺权先锋

印尼归来的姚登山，一旦卷入“文革”漩涡，便如同射出的箭，再也无法回头。八月七日之后，他频频活跃在揪斗陈毅的前沿阵地。一份“文革”小报发表《陈毅为什么不能打倒？！》一文，报道了八月十四日外交部的夺权行动，姚登山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主角：

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于八月十四日上午彻底砸烂了外交部政治部的宣传机构，由联络站和九九兵团联合派出十二人的监督小组，接管了外交部政治部的一切权力负责原政治部日常业务工作并决定取消原总务司人事处，原总务司人事处一切工作归并到政治部。

下午，召开大会，会上，红色外交战士外交部革命领导干部姚登山同志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他说：陈毅不打倒，外交部的其他走资派就打不倒；陈毅不打倒，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不能进行到底。他还说：陈毅为什么不能打倒？他的这些错误如果有十分之一放在其他人身上，也早就打倒了。姚登山还提出，同意不同意打倒陈毅，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分界线，外交部“总部”“攀险峰”是保守组织，他号召：“受蒙蔽无罪，造反有理”。他的讲话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欢迎，不时被掌声所打断。

最后北外红旗勒令姬、乔、刘、符等即日起停止一切业务活动，每日写认罪书，揭发陈毅问题。（《上海风云（专刊）》，上海风云编辑部，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

八月十六日，姚登山在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再次发表针对陈毅的讲话，“文革”小报以《陈毅的问题不是一般的错误》为题摘要予以发表。其中，姚登山特意向红卫兵强调王力对他的支持：

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大量事实的揭发和批判，陈毅的问题就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反罪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在外交部就很明显的出现了“保”和“革”的问题。当人家在打倒陈毅的时候，他就来个打倒无政府主义，什么意思呢？他对陈毅就是保嘛！而且说陈毅同志你犯了错误，你很危险，到了什么边缘……王力同志所以支持我，支持我革命，同志们没有别的，就是在革命中间，就要旗帜鲜明，态度明朗，阵线分明，坚决支持革命派。陈毅是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呢？还是反对毛主席的路线呢？是贯彻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呢？还是执行的刘、邓那一套“三降一灭”的反革命路线？我们根据这个给他定性、批判。（《东方红》，华东纺织工学院的东方红兵团，第七十九期，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不过，读《外交部文革风云》根据一九九〇年姚登山本人回忆所做的叙述，印象有所不同。如果回忆真实无误的话，那么，身处漩涡中心的他，就不像别人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一片狂热，充满“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斗争精神。相反，在陈毅险被劫持之时，他显得相对理智，试图避免事态恶化。这是一段极为重要的场景描述，其间包含丰富的历史信息，耐人寻味，值得悉数摘录如下：

8月26日（星期六）开第三次批陈小会时，发生了劫持陈毅事件。

这次会议原定仍是周恩来主持。开会前，周的外事秘书钱嘉栋来到。钱让人把坐在会场外的姚登山叫进会场说：总理有事要迟来一会儿，委托你先主持开会。可是，会开后不久，就有人要冲会场，劫持陈毅。来冲的人数不少，为首的是北外红旗造反团。姚登山十分吃惊，问钱嘉栋：怎么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事先连一点消息都不知道？钱嘉栋说：知道是知道，但不知道有这么大的规模。姚说：既然知道，应该事先给我打个招呼。情况紧急，核心组的王中琪、夏义善等安排有关人员保护陈毅通过小会议室内一道暗门后面的小楼梯，将陈毅和他的卫士一起转移到二楼港澳办公室的一个套间里休息。一面通过外间的保密电话，立即向总理办公室报告。姚登山在外面劝阻来冲的人，叫他们撤出去。

这些人来的时候，警卫排把他们挡在门口。但来冲的人多，警卫排又临时调来一些战士，手挽手组成人墙，也挡不住。警卫战士一直退到新楼门口（大门在老楼北侧）。这时部里的干部也都出来拦阻，挡住楼门。有几个学生从窗户跳进来，进到楼内，冲进会场。最先进去的是个女生，令她失望的是陈毅外长不在会场里。学生不甘心，在走廊里到处窜，企图找到陈毅。姚登山到外面看到的是秩序很乱，说话没人听，只好大声喊叫，要学生的代表到一楼的一个房间里去谈。一时来了一二十人，姚不知道他们都是什么单位的。这些人对姚劝告他们立即撤出外交部，根本听不进去，纠缠不休。这时有人给姚送来陈伯达对冲进来的人的四点指示，是中央文革刚刚打来电话传达的。姚登山当即宣读，要他们撤出去。又经过一阵劝告和争论，这些人答应撤人。正在这时，周恩来总理来电话找姚登山。姚走出去接电

话时，那些代表要姚转告总理，他们立即撤出外交部，要求总理接见他们。姚登山在二楼第一亚洲司办公室接电话，周总理询问情况，姚汇报说陈总安全，那些人已经答应撤出外交部。姚把看到窗外学生撤退，正在上车的情况也报告了，并且汇报了那些头头特别要他转告总理要求接见等。周表示可以，接见以后另行通知并指示姚登山会同有关人员把陈毅安全送回中南海。

大批学生撤走后，姚登山同核心组商量送陈毅回中南海。姚说：“得换个车吧？学生可能认出陈总的车。”联络站核心组支持这个意见。天快黑的时候，外交部派车由姚登山护送陈毅。出门向东，绕道东四，再折向西，将陈毅平安地送到中南海，进了警卫团驻地的大门，姚才安心回家。（《外交部文革纪实》，一八一——一八二页）

勇敢也罢，狂热也罢，理智也罢，一个人的历史总是会以多种样式书写。四十多年过去，在谈及一九六七年的“文革”风云时，匆匆而来的姚登山，无论如何也不应被忽略，被遗忘。不过，此时人们绝对不会想到，姚登山，乃至王力本人，巅峰时刻其实就是跌落的开始。

◇ 火烧英国驻京代办处

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恰是在红卫兵绑架陈毅的八月二十六日这一天，人在上海的毛泽东，做出了逮捕王力等人的决定。

一年前，一九六六年的八月，接受检阅的红卫兵人潮，“破四旧”行动的惨烈，想必仍清晰地留在人们记忆里。一年后，还是这座城市，还是狂热的人流，狂飙再起。不同的是，此次狂飙所向，主要是“外国敌人”。革命与爱国，似乎从来没有如此紧密地融汇一起，激发出空前的激愤、亢奋、激烈。狂飙之中，理性不再重要，外交规则不必顾忌。雅加达陆续发生的针对中国使馆的外交事件，对红卫兵仿佛是一个启发——对待“外国敌人”，他们完全可以采取同样的行动。

于是，又一个狂飙八月里，冲击“外国敌人”的驻华使馆的激烈行动，将外交冲突推至极端。

首先被冲击的是印尼驻华使馆。我搜集到的一份“文革”小报，在“首都消息”一栏里，这样报道北京“火烧印尼使馆”的行动：

八月五日，印尼暴徒袭击我国使馆，我国人民闻讯后怒不可抑，涌向印尼使馆示威抗议。晚九时半，二外和华侨事务委员会的示威者冲进印尼使馆，把这个印尼反动派在我国领土上的据点付之一炬，熊熊大火照天烧，大快人心。

六日，游行队伍仍不断前往示威，使馆周围贴满了“打倒苏哈托！”等大标语，使馆一片死气沉沉；被焚后的楼房窗户，只剩下焦黑的窗框，院子里堆放各种被砸的东西，狼籍不堪。

这次印尼反动派尝到了中国人民的铁拳。打倒印尼反动派！（《快讯》，工总司化工系统联络总站化肥农药分部、红卫兵华东化工学院新化工师（筹）动态组编印，第十一期，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一日）

“火烧印尼使馆”只是一个开始，包括法国、苏联等国使馆，都遭到冲击。八月二十二日“火烧英国代办处”，真正震惊世界。

与英国发生外交冲突，主要缘于香港的事态发展。自“文革”爆发以来，尚属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左翼”行动此起彼伏，积极呼应着内地红卫兵运动。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因一家工厂发生劳资纠纷，警察拘捕到香港政府去抗议的该厂工会主席和工人代表，局势顿时急转直下：

香港左派人士于是起来声援工人，他们仿效内地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手持《毛主席语录》，列队走上街头，到港督府去抗议示威，要求港督接受他们的抗议，并且在港督府墙上贴满了大字报。这些示威群众受到防暴警察的抗议，许多人受伤，一些人被捕。……中国银行把大喇叭安装在其大厦顶上，进行反对港英当局的广播……（《外交部文革纪实》，一五六页）

内地沸腾了，抗议、冲突，逐日升级。五月十五日起，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组织百万群众，连续三天到英国代办处门前示威；五月十八日，北京举行十万各界人士声援香港斗争大会；六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行动起来，粉碎港英的反动统治》……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帝国主义”替代“美帝国主义”，成了最大的敌人，红卫兵针对英国代办处的行动，有声有色地上演。

在一份“文革”小报上，读到一篇通讯：《红卫兵小将大战群魔英国佬“宴会”终成泡影》，颇为生动、细致地描述了六月九日在英国代办处门前的交锋：

英国驻我国代办准备在六月九日下午六时，在代办处举行宴会，庆祝国庆和女王的生日。北京外语学院红旗英语系支队全体战士和外交学院革命造反兵团部分战士闻讯立即前往，个个英姿飒爽，斗志昂扬，下午三时，把往英国代办处的路全部堵死，整个英国代办处被围得水泄不通。五时许，许多外国人接踵而来，打算参加“宴会”。红旗战士们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向他们揭穿英帝企图借举行“宴会”之名，肆意扩大中东以及香港事态的阴谋。但是某些资、修国家的外交官员却大耍无赖，对我进行挑衅。我红卫兵当场予以坚决还击，把他们搞得瞠目结舌，丑态百出。

一东欧修正主义国家的官员开汽车飞速冲向代办处，就在这紧要关头，红旗一战士挺身而出，昂然屹立在马路中间，挡住了车的去路，那个外国官员没料到这一手，只好来个急刹车，当我红旗战士上前盘问他时，他竟吓得不敢报国名，最后灰溜溜地逃跑了。

据悉，英代办处的我工作人员九日罢工，英代办只得弄点花生米，再开个罐头应付应付，岂知无人赴宴，闹了一个冷席。

印度一个外交官员企图翻墙赴“宴”，吃花生米，未遂。

红卫兵小将经过五小时的奋战，赴“宴”者都被赶回，英国佬“宴会”扩大中东和香港事态的阴谋终于彻底破产。（《反修》上海市反修战线联络站总部，第二期，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最激烈的冲突，八月二十二日晚上发生了。

据《外交部文革纪实》叙述，为抗议港英当局查禁三家报纸、关押十九名香港新华分社记者，中国外交部八月二十日照会英国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并要求四十八小时内解除禁令，释放扣押记者。二十一日，照会公开发表后，由一批造反派组成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反帝反修联络站”，决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采取革命行动，局面顿时为之紧张：

北京市革委会通知外交部，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到现场保护英国代办处，并要外交部派人同他们一起向红卫兵做工作，要红卫兵遵守秩序。外交部礼宾司和西欧司都派人到现场，配

合卫戍区的军官工作。卫戍区在现场安装了大喇叭，反复广播北京市革委会关于外事纪律的规定，要求示威者与英国代办处的房屋保持一定距离。外交部赶紧通知周恩来总理，周立即通知中央文革，要求中央文革出面干预。文革组长陈伯达出面，写信要红卫兵遵守秩序。陈伯达的信在现场反复广播，红卫兵根本不听。接近黄昏，48小时限期到，示威人群冲破卫戍区士兵组成的人墙，涌入代办处，冲进办公室，砸坏了室内所有的东西，并放火烧了房屋。（《外交部文革纪实》，一六一——一六二页）

狂热一旦燃烧，焉能随时熄灭？“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如此这般，在北京发生，震惊世界。

“中央文革”派驻外交部的记者宋正民，当即与和另一名同事前去现场。他这样描述火烧后的现场情况：

我们到那里时，大部分红卫兵已经撤走，马路上还停放着几辆消防车，英代办处有的地方像还冒着微烟，现场一片狼藉，设在那里的各使馆都紧关着大门，只有阿尔巴尼亚使馆一切正常。在场维持秩序和清理现场的部队同志告诉我们，火烧前总理和陈伯达、江青联名四次指示聚集群众“不打、不砸、不抢、不冲、不烧”，但还是未能制止。当我们问到其他使馆和英代办处人员情况时，他们说，除阿尔巴尼亚使馆，别的使馆多少都受到一些冲击，群众冲进英代办处后，英代办翻墙逃跑时撞破头，已送到医院，其他人员也都保护了起来。在场还没走的红卫兵也告诉我们，他们冲进去时，那些英国人吓得到处乱跑，没跑的就跪在地上求饶，这些老外欺侮我们一百多年，今天也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欺侮的。他们说的时候，情绪还很激动。我们看现场，找人了解情况，写报道折腾了几乎整整一个晚上。对这个事件的报道，我们是持否定态度的，但在登“简报”时，按王力的口气改成了肯定的语调。（《飞鸣镞》，第二七二页）

风波没有结束。火烧英国代办处后，又一批红卫兵，将苏联大使馆团团包围，不听劝说撤离。这一次，周恩来亲自出面了。他让秘书周家鼎去找红卫兵的总指挥，自己在靠近苏联大使馆的东城后圆恩寺电影院等候。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在其回忆录《风雨四十年》中，这样回忆当时细节：

总指挥终于找到了，谁也没有想到，这总指挥竟然是个16岁的女孩子，扎着羊角辫，满脸稚气，透出一股聪明劲。她把随身带来的地图铺开，那是一张如何围攻及如何撤退的路线图，与周恩来侃侃而谈，说既然可以火烧英国代办处，为什么不能围攻苏联大使馆，苏联反华，是修正主义，我们就是要反对他们等等。连周恩来都觉得这个女孩子嘴巴有点厉害。他耐心地听完女孩子的意见后，便给她做思想工作，他先肯定女孩子要反修防修是对的，同时充分肯定苏联好的一面，指出用围攻苏联使馆这种办法不对，希望他们赶快撤退。因周恩来在红卫兵中威信很高，说话算数，女孩子马上答应下令撤退。并且很快就有秩序地撤退走了。（转引自《外交部文革纪实》，一六三页）

又一场迫在眉睫的冲突，得以避免。

◇ 物极必反，历史拐了一个大弯

“火烧英国代办处”发生之夜，毛泽东并不在北京。

人在何处？除了高层核心圈，外界无人知晓。

八月二十二日当天的《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八月二十一日接见阿尔巴尼亚专家的消息，但该消息新闻要素缺少了重要的一条：会见地点。这种报道方式，令人费解。二十多年前，我曾多次采访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的王海容女士，计划撰写一部她的“文革”亲历记。她为我解开这一谜团。王海容说，此时的毛泽东并不在北京，而是在上海。关键时刻，在报道毛泽东会见外宾的新闻时，偶尔会采用“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方式，不提及会见具体地点，一九六七年八月如此，一九七三年年底、一九七四年年初筹备四届人大召开时，也是如此。

人在上海的毛泽东，三天之后，听取了自北京而来的杨成武关于北京局势的汇报。

据《毛泽东传》（中央文献版）叙述，八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周恩来单独约见刚从上海毛泽东处到北京的杨成武，向他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特别谈到王力的“八七讲话”，并把一份谈话记录交给杨成武，要他立刻送给毛泽东看；还谈了关锋主持起草的《红旗》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杨成武当天上午立刻直飞上海，向毛泽东汇报。

杨成武回忆当时细节：

“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

“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我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继续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当晚，在钓鱼台，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后来，又根据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的指示把戚本禹也抓了起来。”（《毛泽东传》（中央文献版），一五〇三页）

杨成武所说的“次日上午”，即为八月二十六日上午，此时，距五月一日姚登山在天安门城楼接受毛泽东接见，不到三个月；距七月二十五日王力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欢迎他和谢富治的百万人集会，刚刚一个月。

日子的计算，很少如此具有戏剧性。

批判王、关、戚文革小报应运而生。

“文革”酝酿和高潮迭起时的三个风云人物王力、关锋、戚本禹，相继被捕，瞬间跌落。姚登山，这位自印尼归来而深深卷入外交风云的“红色外交战士”，随即也在公众视野里消失，在九月散发的“文革”小报上，《当了四天“外交部长”的姚登山干了些什么？》这篇檄文，标志着这颗外交新星的陨落。一九七一年，姚登山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同样被捕，关进秦城监狱。

局势由此大逆转。“文革”从此走出狂热，历史走向，为之改变。

一九九三年七月，我曾采访过王力。他住在北京紧邻北三环路的一幢普通楼房里。当时，王力正在系统撰写回忆录，重点集中在“文革”的起落跌宕。我去采访他，不是谈“文

革”，而是谈周扬。眼前的他，清瘦，平和，朴素，穿一件白色旧衬衫，坐在沙发上，普通得一点儿也不能相信，他竟然就是“文革”初期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的王力，就是一九六七年发表“八七讲话”卷起外交狂飙的王力。采访他的这一年，王力七十二岁，我在想，大起大落的经历，岁月的消磨，或许早已改变了他。但是，一旦开始交谈，我仿佛又看到了昔日风云人物的身影闪动。他健谈，条理清晰，思路敏捷，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他，话语间仍带有一种纵论天下的气势。他没有过多谈自己，更没有谈“文革”亲历，不过，在谈到周扬时所说的一句话，今天想来，却仿佛不仅仅限于谈别人：“周扬从不是代表他个人，任何人处在那个位置，都得那么做。……这就决定了他的历史不是个人的历史。”

一九九六年，王力去世。一九九八年，姚登山去世。

带走“文革”历史细节的当事人，一个接一个地走了。

岁月无情。复原真相，复原“文革”漩涡中每一个真实的、大大小小的风云人物，恐怕只能是诸多历史叙述者的奢望。

遥远的历史彼岸，永远无法抵达……

□ 来源：《六根》微信号

~~~~~

【出版动态】

《北大文革武斗纪实》序和跋

• 奚学瑶 • 张 从 •

◇ 序 • 奚学瑶：恶梦醒来是清晨——北大武斗五十年祭

二零一八，北大经历了百廿历史，岁交两个甲子，当是煌煌大庆。我辈北大学子，年逾古稀，有约或无约，于校庆之日相聚于母校家园故土。

未名湖微动涟漪，湖畔花草丰茂，杨柳依依，博雅塔依然刚强坚挺，“一塔湖图”显示着北大的风貌与风骨。越过百年讲堂和三角地，来到了学生宿舍区，始觉旧貌变新颜。一代莘莘北大学子，衣着光鲜，明眸亮丽，对现实与未来充满了自得与自信。是啊，他们是当今社会的骄子，他们是现在北大的主人！

新的学生宿舍楼群已非原来古朴的面容，它们更高大，也更漂亮了。它们已不认识我们，我们却记得它们的前身。我们的青春身影，曾在此处跃动穿行，有诗书的音响，也有歌舞的欢欣，有大书包里碗筷的叮当声，更有同学间争论与调侃的南腔北调音……然而，更加铭刻在我们记忆深处的是那个动荡的时段，这一百二十年中空前绝后的一百二十天！那个刀光剑影，血火交进的武斗场景！

时光已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这一片当年的古战场，已经了无旧痕。师弟师妹们在欢乐和幸福中生活，我的随同的小孙女也睁大憧憬未来的眼睛。不要再提那一段惨酷的历史了吧，对于他们，这一切都已恍如隔世。他们能理解吗，有必要去聆听它吗？“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还是谈笑一下拉倒吧！

可是，历史能拉倒吗？当年北大武斗惨剧总导演聂元梓，在一些人的簇拥下，仍在陆续出书，她在书中叫喊：“让历史告诉未来”，“我人还在，心未死！”“要推翻种种强加于我的不实之辞和罪名，冲掉泼在我身上的污泥浊水。”（《聂元梓回忆录·自序》）。一个曾经作恶多端的老妇人，如此顽固坚持自己的罪恶立场，而且，在她的带领下，还有一些她当年忠实的部下，跟着她一起喧嚷鼓噪，篡改或掩埋北大文革真实的历史，为文革翻案的黑红暗潮推波助澜。这使我们深深警悟到，作为北大文革的受害者，聂元梓的对立面，便不能做东郭先生，怜悯和宽容落水狗。对她这个刑满释放的老人，一时孤苦伶仃，可以平和对待，给人以道温情。但是，对于过往的事实，则一点也不能含糊。历史事实，是文物，是舍利子，它们是日月精华的积淀，愈久愈有价值。“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知道事物的来龙去脉，明晰事物的发展规律。从血泪中取得历史教训；从血泪中透视社会的真谛；从血泪中坚定青年人对理想纯真的追求。因此，我们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无视道义担当，背叛自我，舍弃未来！

永生难忘的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晚上，我与同班同学、上海老乡成少安自沪返京，坐车从北京站返回北大，北大校园异于往常，一片昏黑肃杀。我们居住的三十二楼秩序混乱，气氛压抑。后来得知，当天凌晨，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突袭三十一楼，挑起了大规模武斗，致使一、二百名井冈山同学受伤。他们用武力驱赶井冈山兵团03和01纵队的男生，占据了具有战略地位的三十一楼，导致了这些同学无枝可栖，只得入住三十二楼。更令人愤怒的是，事后，武斗策动者聂元梓却以制止武斗者身份，陪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到武斗现场视察，演出了贼喊捉贼的现代恶剧。井冈山同学出于义愤，群起将聂元梓抓伤。李钟奇一时昏乱，制造了一个所谓的凶手“用黑把匕首”刺杀聂元梓的错案，导致北京市革委会，下达了捉拿所谓的刺杀聂元梓凶手的一份严厉的“四点指示”。正可谓“黑云压城城欲摧”，此时的井冈山兵团上上下下，满腔悲愤，申诉无门，经受着极大的政治和心理压力。第二天，中文系四年级的王涛同学从医院回来，向同学们讲述了那天毫无防备的朱殿庆同学，被公社武斗队员用长矛扎穿腹部的悲惨状况，说话中间，忍不住嚎啕大哭。男儿有泪不轻弹，闻之者无不为之动容！

井冈山兵团是个松散的群众团体，是一个崇尚民主、自由的集合体。在反聂抗暴的旗帜下，团、零、飘、井、红，五个组织联合而成，可谓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往往对一个问题认识，争论不休，很难取得共识。下边各纵队、各战斗队的组织观念也很淡薄，故往往队自为战，人自为战。井冈山兵团总部执勤的都是一些学生，一些未经政治高压锤炼的年轻书生，坚贞良善而不够成熟老到。聂派在校内外失道寡助，文攻乏力，图穷匕首见，便妄图以武力一统天下。他们早就在暗地里编练武斗队，装备武器，准备发动一场武斗以摧垮井冈山兵团。对此，一些井冈山群众、广播台工作人员，还有武警出身的井冈山保卫组长——法律系学生吴金岳都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吴多次向兵团总部提出警告。总部领导人对此不以为意，仍以善良之心度之，未做任何防备。导致吴金岳负气出走，挂印归乡，直到工宣队进校，才返回北大。

聂元梓是当时炙手可热的大左派，以她为首的北大校文革，被他们视为不可触动的所谓的“红色政权”。他们有恃无恐，忘乎所以，认为“反聂即反动”，“反聂即反中央文革”，“北大两派斗争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他们狂傲地以正统的当权派自居，以为可以对对立派为所欲为，无法无天。1967年8月，在阴狠的张春桥的指使下，上海工总司，武力摧垮了与工总司有不同意见的上柴联司。罪恶的先例，震动了全国，无疑也为聂元梓阵营中的鹰派树立了样板，以武力摧垮反对派。只是此举毕竟触动了违反人性、人道的底线，公社内部有良知者并不赞同。他们或者公然提出反对，或者隐退，与此恶行切割。但是，公社之中的狂热者，下定了决心铤而走险。他们在聂元梓的批准下，终于发动了精心准备的“三·二九”大规模武斗，在北京高校开启了罪恶的先例，燕园里一片血雨腥风！

哪里有镇压，哪里便有反抗。聂元梓对井冈山的武力镇压，倒逼松散的井冈山兵团进行整合，教育了书生气十足的兵团头头们，为正义，求生存，促使井冈山兵团空前团结，焕发了前所未有的战斗力和聪明智慧，或飞架天桥于高空，或俯掘地道于深层，截听电话于无声之中，架接高压线于武斗战场之上……没想到，一个个文弱书生，竟然成了披坚执锐，顽强抗争的武士！这样的锤炼，大概已经达到毛泽东所说的革命接班人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要求了吧？这样的特殊学业，在北大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了吧？

我们在和平喜气的校园里徜徉，目测当年两座高架桥的距离和高度，估摸截听地下电话线路的位置，心里确实钦佩师兄弟们的胆略和智慧。但是，细嚼往事，逐渐转为苦涩和苦痛，当年惨酷的场景，像蒙太奇一样，一幕幕浮现在脑海：樊立勤被抓，老虎钳夹断他的手指，膝盖被钉得粉碎，竹签子楔入了指甲……邓朴方被绑架关押数月而跳楼致残；韩琴英被残酷殴打而流产；数百名同学被打伤打残……更有甚者，刘玮、殷文杰、温家驹三人丧失了年轻的生命。一百二十天枪（矛）林弹（弓）雨的紧张和危险，被围困在六座楼里，遭受断粮、断水、断电的困厄，似可以轻轻带过；那些伤残者，亦因伤愈可以淡忘；但那些致死的亡灵，在杀人者始终不肯忏悔认罪的情况下，他们怎能在地下安息？经过四十楼与四十四楼前面，我不禁想起被活活打死的刘玮，想起被捅了三十九枪的殷文杰，想起他们临死前的惨叫，不觉毛骨耸然，心头一阵阵发紧。这是魔鬼的行径，这是法西斯的罪恶，我们怎么诅咒它们都不过分！这里不是小说描述的魔窟渣滓洞、白公馆，这里是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受害者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同窗学友！对于受害者最好的悼念，就是将杀害他们的恶行载入史册，让世人知道元凶是谁，知道罪恶的根由，懂得何谓人道、人性，何谓人权？懂得善恶，懂得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发动武斗，猖狂镇压群众，是聂元梓罪恶中的罪恶，是她问题的要害所在。正如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杨振宁、周培源时，曾把聂树为文革旗帜的毛泽东也认清了聂元梓。他向在座各位气硬力沉地说道：“聂元梓这一派太坏了！”周培源高度概括，一语中的：“聂元梓当时猖狂镇压群众。”（《北京大学纪事814页》和北大档案馆有关史料）北大聂派之所以在北京高校首发武斗，这绝不是偶然之举。它是政治斗争的延伸，是没有现代民主意识的文革新贵，造反掌权，一时得志的疯狂；是封建个人崇拜，“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恶果；是慈禧老佛爷式集权独裁、迫害异己的必然指归。专制的极端便是暴力，便趋同封建法西斯，趋同极左，这是历史的铁律。现在，老佛爷聂元梓及聂粉们居然以反极左的“右派”自居，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这一本书，以大量的史实，从不同方面记载了五十年前北大一段令人刻骨铭心的痛史。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将之深藏在记忆之中，不愿揭开这道伤疤。然而，武斗发难一方的少数人等，却在近几年，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他们或者模糊武斗的真相，把“三。二九”大规模武斗前的小摩擦指作武斗起始，然后各打五十大板。他们或者将“三。二九”武斗发生之后，四十楼井冈山兵团十纵奋起反击的小规模战局，指作武斗发生的起源，从而逃避他们是武斗肇始者的历史罪责。其实，我们对他们的要求并不高，只要他们如实讲述武斗始末与真相，说一声对不起，忏悔认错，也就罢了。遗憾的是，知情者至今没有一个人站出来道明事情真相，说一声对不起，更不要说忏悔认错，反而想洗白历史，污黑他人，倒打一耙。严酷的现实，逼使我们编辑这一本集子，还历史一个真相，给世人一个公道！书中我们也收录了原公社派中有正义感的同学，他们比较客观地书写了他们亲身的所历所闻，让人们了解有关武斗中的真实情况。对此，我们深表敬意。

历史告诉我们，镇压学生运动的人绝没有好下场；违背人道人性的暴力的行使者终将遭到历史的惩罚；不认罪不忏悔的罪人，终将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遭受世人和后人

的唾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让历史告诉未来，让子子孙孙们知道，罪恶的文革覆辙不可重蹈，作为文革标志性人物、罪行累累的聂元梓聂老佛爷休想翻案，她逃脱不了历史的正义审判！

恶梦醒来是清晨。愿当年的血腥化为朝霞，愿泪水洗净雾霾。北大民主、自由的鸟儿与彩霞齐飞，未名湖水共蓝天一色！我们的母校，我们的家园，永远温馨，永远安宁！我，一个年迈的老者，北大文革的亲历者，为北大后来的学子，深深祝福，祝福！

2018·7·23

◇ 跋·张 从：记录历史，还原真相

北大120年校庆前夕，部分校友在一起聚会，有两位校友得知笔者近年来从事北大文革历史研究，便建议道：“应该把北大文革中的武斗专门写一本书，这段历史太重要了”。

校友的建议给了笔者很大的启发。

确实，发生在1968年3月29日到7月28日的武斗在北大文革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它表现出了以聂元梓为首的北大校文革，为了镇压不同意见群众而采取的极端凶残的手段和某些文革极端分子丧失人性的丑恶面目，在北京乃至全国高校中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是北大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同时，这场武斗也影响了最高领导人的决策和部署，从此对知识分子造反派失去信任，改由军队和工人占领上层建筑，影响了以后长达8年的文革进程。所以说北大（和清华）的武斗改变了文革的历史，是历史的一个折点，这句话是毫不夸张的。

聂元梓由第一张大字报起家，成为为文革中第一造反派领袖，曾经头顶光环，不可一世，为所欲为，干了许多坏事，但她最重要的坏事就是发动北大武斗，镇压北大群众，也因此而走向反面，被最高领导者抛弃，1968年8月19日工宣队进校后她就失去了权力，1978年后更失去了自由，1983年被判处17年徒刑。北大武斗，也成为她人生中从大红大紫走向失败的滑铁卢。

具有五四传统，崇尚科学民主的北大师生，是不会让聂元梓这样一个品德低下、专横跋扈、倒行逆施的野心家来统治北大这个煌煌上庠的，他们曾用大字报、串联会等方式表达不同意见，反对聂元梓的专制统治，但他们过于善良，没有料到聂元梓及其帮凶们竟然如此凶残地发动了武斗，抓捕了大量的群众，采用丧失人性的手段拷打、刑讯逼供，甚至打死三人，致残多人。为了生存，“井冈山兵团”的学生们不得不困守在6座宿舍楼，采取各种方式求生，抵抗住了聂元梓手下的武斗队伍多次进攻和断水、断粮、断电等手段的威胁，守住了这6座楼，坚持到武斗结束。应该说，北大武斗，不是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争斗，而是北大当时的统治者与部分群众之间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井冈山兵团的反围剿斗争，是具有正义性的。

风烛残年的聂元梓“人还在，心不死”，近年来在香港出版的《聂元梓回忆录》和《我在文革漩涡中》中，极力为自己辩解、洗脱，抵赖她在文革中的罪行，尤其是发动武斗、镇压群众的恶行，还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和反“王关戚”的英雄。也有几个她的追随者，或著书出版，或在网刊中发文，为其辩护，甚至吹捧，企图蒙蔽不明真相的读者。因此，用事实揭穿聂元梓及其追随者的谎言，还原历史的真相，是非常必要的。

本书的作者都是北大文革的亲历者，既有原“井冈山兵团”的成员，也有原“新北大公社”的成员，还有一位外校的朋友（理胜）。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中作者用亲身的经历记述了北大武斗的从发起到结束的全过程，记述了聂派武斗队如何凶残地将井冈山学生赶出31楼，如何灭绝人性地封锁校园，抓捕、殴打井冈山学生，而井冈山学生又如何在艰难困苦中求生，架天桥、挖地道、接高压线、监听电话、购买粮食蔬菜等具体情况，唐利、司徒文、张曼平、俞小平、樊能廷、耿天彭、汪凯戈、田建行、戈辰、况明星、姜承永、梁正路和地球物理系、化学系部分同学的记述都十分客观真实。下篇主要记述了在武斗期间发生的校内有关事件，包括聂派武斗队打死三人，大量抓捕干部、教师、学生并私设监狱，关押、刑讯被抓捕者，导致邓朴方和樊立勤致残的情况，披露了所谓的“刺杀聂元梓”案件的真相以及聂元梓亲自下令挑起武斗的事实。通过这些记述，读者可以大致了解北大武斗的全貌和由武斗引起的其他有关事件。

最近，笔者在访问哲学系一位83岁的老教师时，他说：“聂元梓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权后迫害、镇压群众，包括干部、教师和学生，研究北大文革历史，就要抓住这个最大的问题，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这位老教师说的很对，研究者应该以此为重点，进一步搞好北大文革历史的编写工作。

揭露事实真相是必要的，还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反思，分析研究，提高对文革本质的认识，本书在这些方面尚有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提高。

由于时间已经过去半个世纪，有关文革资料难以查找，当年的年轻学子已经成为年过古稀的老者，仅凭作者的记忆，本书中的一些记述难免在时间、地点和细节方面出现缺漏和差错，还请知情者给予补充和指正。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许多校友的支持，有些专题还在微信群里进行过讨论，给了编者很大帮助。在此，向给予本书关心、鼓励和支持的校友致以诚挚的感谢。

□ 原载：《北大文革武斗纪实》，张从、樊能廷、俞小平主编，2018年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